
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 怎样的增长率？

蔡昉 陆旸

摘要：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开始负增长，推动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和资本供给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条件，都趋于减缓经济增长。我们的估计表明，中国潜在产出年均增长率将下降为“十二五”期间的7.2%和“十三五”期间的6.1%。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本文模拟了两个最重要途径——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参与率 潜在增长率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陆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引言

在中国过去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推动了高速增长，其传导机制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正是资本供给的重要条件。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进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结构问题。简单概括来说：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很少能够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人口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红利”总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债务”：即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报酬递减、储蓄率降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潜在增长率受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供给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核算方程中，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降低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此外，劳动力无限

供给条件被打破，将直接引起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与此同时，抚养比上升又会引起储蓄率下降，进而将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的高投资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投资率下降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势必降低。

事实上，中国人口结构转变进程要快于一般人们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减少的速度更快^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2》在“六普”数据基础上预测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报告显示：按照现有趋势，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从2010年已开始减少。即使从现在开始执行“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也无法改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递减的趋势。这一基础性变化进而改变储蓄率、资本报酬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

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为此，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在给出具体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针对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潜在增长率不应人为超越。因为潜在增长率是现有的要素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远离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过度刺激导致通货膨胀、在产业政策支持下形成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的产业和企业，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超过“生态阈值”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伤害。

第二，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改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是要改变这些因素，就会涉及到各种改革，而改革正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市民化，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更稳定，这本身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清除制度障碍，让他们能够持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就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惟一源泉，而途径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根据变化了的人口结构，估计中国未来的GDP潜在增长率。在今后10年潜在

① 虽然我们通常采用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但是中国的退休年龄中，男性60岁，女性大部分55岁。而且中国最大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受教育年限低，而在于随着年龄的提高，其受教育程度是在迅速下降的。即我们的退休年龄是官方规定的，而由于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是很低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员继续就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15-59岁人口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

增长率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看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因此，本文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阐述经济增长所应依托的源泉。

二、估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根据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对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出一定假设之后，估计了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及其变化趋势（图1）。我们采用的增长核算方程及其对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进行的估计，基于一定的外生假定条件，这些假设锁定了中国未来潜在GDP增长率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分别论述这些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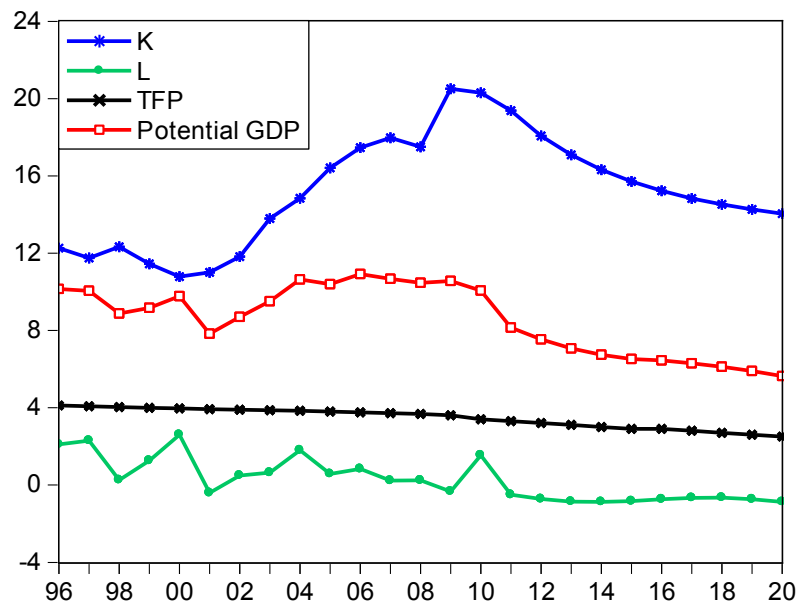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存量、潜在就业增长率、TFP、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1996—2020

注：图中K表示资本存量增长率，L为潜在就业增长率，TFP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Potential GDP为GDP潜在增长率。

假设 I：未来10年投资平均增长率将趋于降低

从历史数据中看到，1978—1994年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中国的平均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3.43%。1995—2009年这一指标增加到16.89%。其间，2003—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均超过了20%。特别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当年的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性的高位33.15%。如果不考虑

2009年的特殊因素，1995年之后中国投资增长率也高达15.64%。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投资增长率将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中国经济增长过程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再平衡。而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已经不是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而越来越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失衡。因此，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应有所放缓。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抚养比提高，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储蓄率也倾向于降低，投资率将随之下降。第三，由于投资增长率受资本回报率的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将抑制中国投资增长率。

我们采用白重恩等（2006）对资本回报率的估计结果，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wK——“资本回报率”（%）；被解释变量I为“不包含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198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方程：

$$I = -6.13954099435 + 0.945869473894 * wK$$

(19.73116) (0.842181)

$$R^2 = 0.054227 \quad D.W. = 0.976468$$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将原始数据中1996-2005年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平均值20.22代入以上方程，可以得到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2.99（单位为%）。因此，在预测潜在增长率时，我们假定2012-2020年中国平均投资增长率约为13%。应该说，这样的假设主要还不是依据上述模拟，而是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做出的，同时不考虑政府对投资做出过度干预的可能性。根据上述投资增长率的假设前提，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未来的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变动情况。

假设II：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我们假定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与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保持一致，即NAIRU=4.132%（都阳、陆旸，2011），劳动参与率等于趋势劳动参与率水平。从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峰值。此后，2011-2015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33%；2016—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31%。这也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的就业增长率为-0.76%；在“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的就业增长率为-0.74%。实际上，由于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十二五”初期就开始减少，在自然失业率和趋势劳动参与率一定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对中国未来潜在GDP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III：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高路易认为，在1994—2009年，中国TFP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企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制造业非常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Kuijs，2009）。然而，在未来10年里，上述因素对TFP增长率的影响将会变小，因此高路易认为中国TFP增长率每年将下降0.5%—2.3%。通过我们对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HP滤波分解，得到了中国2011—2020年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发现，2011—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10%；2016—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约为2.70%。

根据上述假设前提，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TFP增长率都是下降趋势；投资增长率保持在13%水平（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因此，在增长核算方程框架内，我们可以估算出2011—2020年中国潜在GDP增长率。我们发现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很可能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十二五”时期（2011—2015），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2%；“十三五”时期（2016—2020），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6.1%。我们的估计结果要远低于高路易（Kuijs，2009）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估计结果。但是考虑到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不再发生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趋势并没有被我们低估（见表1）。

表1 基于增长核算方程的潜在产出结果（1978—2020）

指标	1978—1994	1995—2009	2011—2015	2016—2020
实际产出增长率(%)	10.06	9.90	—	—
潜在产出增长率(%)	10.29	9.83	7.19	6.08
实际就业增长率(%)	2.45	0.97	—	—
潜在就业增长率(%)	3.23	0.90	-0.76	-0.74
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6.55	8.84	—	—
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6.85	8.86	8.02	6.87
TFP增长率(%)	0.78	3.89	3.10	2.70
K/L增长率(%)	10.38	13.29	18.21	15.43

注：作者根据增长核算方程估计得出。

三、提高劳动参与率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80%；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7.26%。按照地区类型分，城市、镇和乡村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62.20%、67.32%、77.62%；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

与率分别为68.18%、73.27%、84.92%。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相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此外，如果考虑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还会更低。

第一，我们按照通常口径计算的劳动参与率都包含了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务农就当作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有工作。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口径计算劳动参与率时将除掉农业的情况，则更能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因此，我们计算了非农劳动参与率指标，并发现以这一口径计算的结果显著低于通常口径计算的结果。以20-25岁年龄段来看，常规口径下计算的劳动参与率为72.55%，但是除去农业后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为62.76%。因此，考虑到指标计算问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六普”调查中显示出的结果并不乐观（表2）。

表2 按年龄组和性别划分的中国劳动参与率（%）

年龄组	劳动参与率 (包含农业)	非农劳动参与率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16-20	32.44	33.06	30.72	21.78	22.53	21.31
20-25	72.55	76.66	69.70	62.76	68.91	58.95
25-30	88.88	95.73	82.10	84.33	94.01	74.61
30-35	90.30	97.01	83.47	85.98	95.73	75.79
35-40	90.62	96.92	84.18	85.53	95.36	75.02
40-45	90.73	96.63	84.74	84.43	94.50	73.41
45-50	87.73	95.06	79.58	78.49	91.64	62.87
50-55	76.31	89.90	62.62	56.99	81.62	32.19
55-60	67.29	80.41	53.71	37.57	60.88	15.04
60-65	49.59	58.14	40.11	13.80	22.41	5.8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1%样本计算得到。

第二，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变化呈现出了典型的“倒U型”（见图2）。这一结果很容易得到解释：在低年龄组中，由于仍然有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学习状态，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随着年龄增加，当进入30-45岁之间的年龄组后，劳动参与率将大幅提高；当进入高年龄组时，又会因为年龄增加与工作岗位之间匹配程度的下降，以及养老意愿的增强，劳动参与率开始急速下降。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传统口径的劳动参与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人口结构变化将带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急速下降。随着人口老龄

化程度上升，劳动参与率将下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我们知道，在劳动年龄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决定了就业规模，进而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看到，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就业增长率将开始为负值，平均每年的潜在就业增长率为-0.76%；到“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为-0.74%。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左右开始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峰值出现的更早，在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从理论上来看，随着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会有所下降。因此综合以上因素，中国的潜在就业人数将呈现递减的趋势。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甚至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提高劳动参与率将成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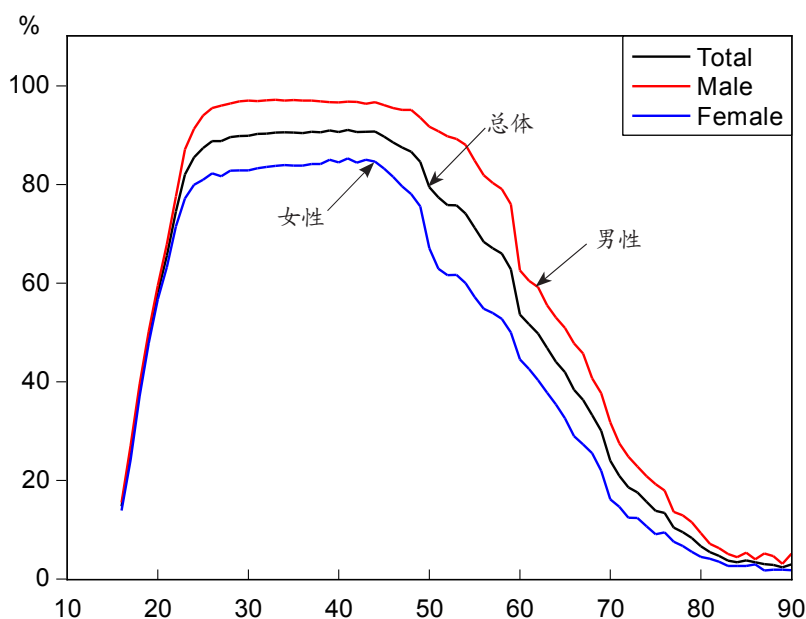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六普”数据

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我们在已有的模型基础上，假设在2011—2020年期间，在中国劳动参与率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09%；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6.94%。在图3中，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平均每年将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有多种途径，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具有最为显著效果的包括以下三种。第一是延长就业时间或提高退休年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政策手段，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扩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然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特征是，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年限显著降低，意味着临近退休的劳动者有着很大的就业难度。因此，至少在近期内这条路难以产生明显的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第二是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较高，仍然有着较大的劳动力转移空间。进一步推动劳动力转移有赖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第三是提高就业率或降低失业率。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新古典特征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挑战，需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城乡居民的最大化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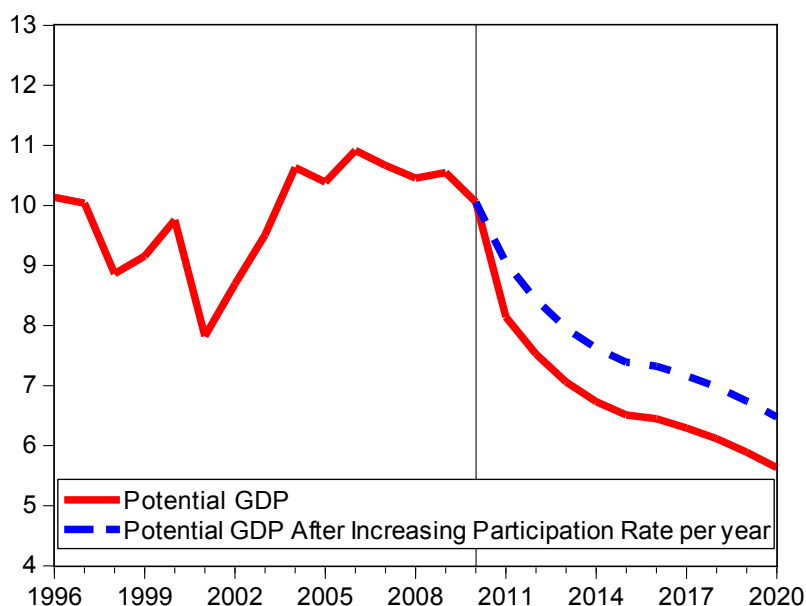


图3 劳动参与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注：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从2011—2020年在原有趋势劳动参与率基础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既是一种简单易行的

政策手段，又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特质，容易被决策者接受，实施起来也比较直截了当，但是最终会伤害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办法，大多有赖于在诸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通常要求长期和艰巨的努力。但是，中国经济出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说明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进一步的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通常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创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致在3%左右。如前所述，中国改革措施促使生产要素得到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巨大。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即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种“低垂的果子”。

随着剩余劳动力被逐渐吸纳，疾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置不再可得，此外，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因此，需要在更深的层次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作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至关重要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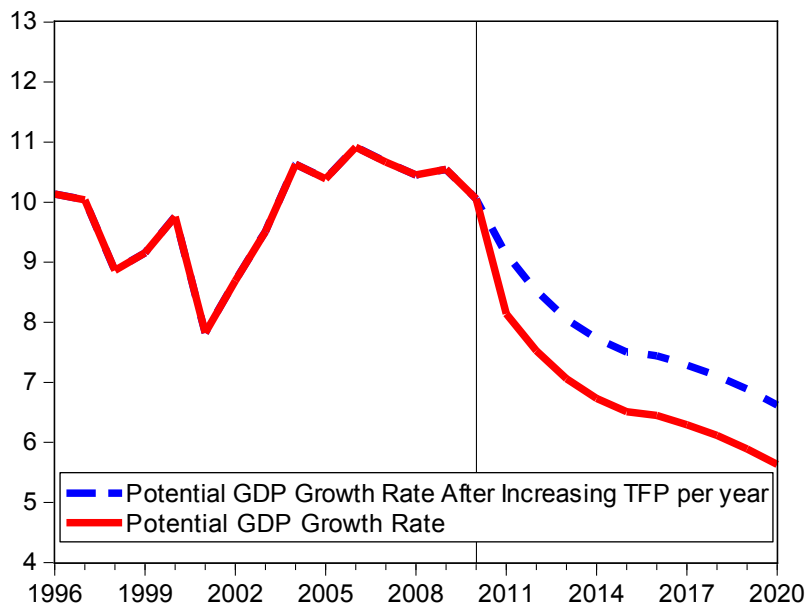


图4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注：实线表示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在2011—2020年期间，在原有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个百分点后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有模型基础上，我们假设：在2011—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例如，假设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3.01%，那么提高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为4.01%。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19%；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7.07%。在图4中，实线表示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虚线表示从2011—2020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中国平均每年都能够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0.99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的新古典增长时期的来临，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目标具有很大的难度，既要有坚定的决心，又需要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新的源泉。新加坡政府在对待经济学家对其增长模式的批评，就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Felipe, p. 27）。

对中国来说，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第一，由于非农产业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第二，各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地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从这些源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求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特别是进一步界定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有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五、关于政策取向的建议

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逐渐慢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乃至劳动力供给负增长，而同时经济增长继续创造劳动力需求，推动了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而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乃至消失，二元经济发展相应就转向了新古典类型的经济增长。这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一个比较接近于典型的新古典增长的经济体中，即在目前成熟的发达国家中，GDP增长率并不可能达到赶超经济体所具有的那样高增长率。相应地，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在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终究要减速（Eichengreen et al., 2011）。因此，中国在从二元经济发展转向新古典增长的过程中，本文所预测

的潜在增长率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数量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可见，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从供给方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如果错误地以为依靠对需求方因素的刺激，可以使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则会造成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各种扭曲，欲速则不达。

相反，正确的政策取向则坚持以下两点。首先，接受这个降低的潜在增长率，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不要遇到需求冲击便惊慌失措，而要看经济增长是否会降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如果不是，则出口疲软和投资需求不足等因素恰好可以成为转向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契机，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其次，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深层的方面，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或者至少在未来不至使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改革促发展的道理仍然成立，但是，今后的改革不再是低垂的果子，的确需要持之以恒，着眼于未来。

参考文献：

1. Felipe Jes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 EDRC Report Series, No.65, 199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Philippines.
2. Louis Kuijs, (2009),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9.
3. 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第2期（中文翻译稿）。
4. 蔡昉（主编），2008，《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5.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都阳、陆旸，2011，《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及其含义》，《世界经济》第4期。
7. 郭庆旺、贾俊雪，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
8. 张军、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第7期。
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中国发展报告2012》，中国发展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英奎

play as a balancer in order to obtain advantages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reform would certainly be advanced slowly and gradually. To include the RMB in the basket of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could be the first break. The internalization of RMB should be adap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aking a modest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as one of the sub centers of the global system, it should make some progress in Asia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key areas of which include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Chiangmai Initiat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nds.

(3) What GDP Growth Rate Will China Achieve in the Next Decade?

Cai Fang and Lu Yang-027

As a result of the shrinkag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t ages between 15 and 59, all factors which have driven the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over 30 years tend to diminish after 2010. This paper estimates annual growth rate of potential output to be 7.2 percent in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6.1 percent in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maintain future sustainable growth requires economic reform in related areas to enhanc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is paper simulates two scenarios in which both increase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potential GDP growth rate. It also draw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4) Onlook And Analysis Of 2012-2013 World Economy

Chen Wenling-038

In 2012,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the long term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hort term Eurozone debt impact, European economy has been in crisis, US economy shrinking, Japanese in a long economic recession, while the growth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China's, are slowing down, thus the world economy ended in diversified complexities, and still struggles in difficult recovery. Looking ahead to 2013, world economy will endure a low growth, demand of the main economies will remain weak. Meanwhile,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will undergo a volatile change,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ttern of new global governance will be a long process.